

FANGTAN: YIGE DIANYING YANJIUZHENG DE FENGYU RENSHENG

福建教育出版社

郑雪来 / 著

访谈

一个电影研究者的

人生

郑雪来

回忆录

访谈

一个电影研究者的风雨人生

郑雪来回忆录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访谈：一个电影研究者的风雨人生：郑雪来回忆录/
郑雪来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11
ISBN 7-5334-3905-8

I. 访… II. 郑… III. 郑雪来—回忆录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132 号

访谈：一个电影研究者的风雨人生

——郑雪来回忆录

郑雪来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 83786690 83726971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75 印张 190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4—3905—8/K·103 定价：15.6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 - 83786692）调换。

目 录

引 言

..... (1)

一、家世与幼年

福州被日军占领，街边上坐着几排日本兵，行人路过都被勒令行鞠躬礼，我也不得不照此行事时，心里却充满着憎恶和仇恨。

..... 4

二、短暂的大学生活

一路上不断换乘“黄鱼车”，随时都有可能从装满货物的车顶上掉下来。然而到达重庆时已是深秋季节，办理转学手续的时间已过，没料到我那短暂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了。

..... (10)

三、二战经历

有几次炮弹就落在我睡的小掩体（临时宿营地都挖有供一个人睡的小掩体，四壁用降落伞蒙住以防潮湿）近旁炸开，早晨出来一看，发现好几匹骡马都已倒毙在地。

..... (15)

四、解放前后

《文艺理论家》那篇采访记中曾这样写道：“24岁是个不大的年龄。相对于别的24岁的人，郑雪来经历了别人无法经历的事。他24年的阅历是丰富多彩的。但郑雪来的心是24岁青年人的心，新中国明朗的天对他应该是耀眼而炫目的。”

..... (27)

五、与斯氏体系结下不解之缘

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那篇文章，使我国话剧、电影、戏曲界的诸多人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一直在追踪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中南政法财经大学教授古远清，被余秋雨告上法庭后曾在一篇短文中表示希望我能“站出来指证”《评“体系”》一文曾

经带给我的“身心折磨”。

..... (34)

六、选择电影作为终生事业

1965年初，上面已派出很多部队转业干部到各协会“掺沙子”，正常业务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但我们外编室又办了两期《外国电影资料》，内容主要是介绍“苏修”的最新电影动向，……这个刊物虽是严格的内部发行，但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许多电影艺术家都吓得不敢订阅，有的电影单位接到订单后，甚至还批评我们：“都这种时候了，还干这个！”

..... (53)

七、“文革”中的遭际

我和袁文殊、钟惦棐及另外两个人被编在“监改小组”里，干最累最脏的活。曾被毛主席亲自点名的“大右派”钟惦棐被派去挖茅厕，男男女女的茅厕十几个，每天都得挖一回；袁文殊劳动时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腿，还要一瘸一拐地推着水车过很窄的木板桥。我算是“年轻力壮”的了，背套、起猪圈、割草、轧草、拉马耕水田、和泥小工等累活无所不为。有一次我去天津某处拉葡萄藤，我大妹见到我那副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模样都伤心地哭了：“哥哥怎么会落到这个样子！”

..... (64)

八、迈向电影研究

外国“政治电影”是我国电影界的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如能补这个空白，对于了解六七十年代西方电影思潮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意义。大约在1978年初，我集中了一段时间研究意大利政治电影问题。

..... (72)

九、参加电影学术论争

我带着《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这篇论文去参加上海《电影新作》编辑部召开的讨论会时，确实是很“孤立”的。这个刊物可说是“电影就是文学”说的理论基地，为该刊经常撰稿并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几乎全是“电影就是文学”说的拥护者。我仿佛感到，我面临的又是当年在缅甸战地美军中的那种“舌战群儒”的场面。

..... (78)

十、频繁的讲学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讲到我不同意某些人对影片《太阳和人》（《苦恋》）的粗暴评论时，会场里响起

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可以看作是对长时期盛行于文艺评论界的“左”的现象的一次群众性批判。

..... (105)

十一、初访欧洲电影界

我刚一抵达巴黎，就向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里欧-贝鲁先生提出，很希望能看到加夫拉斯的《招供》(1969)和《失踪》(1980)这两部遐迩闻名的“政治片”，他不久就满足了我的请求。

..... (113)

十二、做客英国、瑞典的电影学会

伦敦有两家很有名气的“艺术电影院”，一称“诺丁山”，一称“布鲁姆斯伯利”。前者是个规模不大的“夫妻店”，由一对夫妇经营。但列在他们每月放映节目单上的竟是五六十部世界名片。

..... (139)

十三、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见闻

鱼，代表着酷肖耶稣基督的桑德罗。父亲吃鱼，鱼骨头留在儿子阿维尔手里，这意味着他们是“一脉相承”。而没有任何国别和时代标志的骑士甲冑，那是暴力的象征。“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暴力、专

制、压迫……还有那无辜的被告，无辜的罪人，无辜的受难。”说到这里，阿布拉泽的眼睛湿润了，我仿佛看到，这位艺术家的心还在为他影片中那些善良的受难者经受着煎熬。

..... (174)

十四、社会职务及相关活动

参加政协期间，每年都要随一个代表团到某省、区进行专项考察。这给我提供了开阔眼界、饱览祖国河山的极好机会。在这10年间，我随团去过十多个省、区，进行各不相同项目的考察。

..... (193)

十五、为电影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凡此种种，都使我深深感到“著书立说”固然诱人，但绝不可以去讲“空话”、“陈言”，绝不可以去搞“抄录”、“汇编”，而要做到言之有物，又能言人之所未言，必须进行长期酝酿，不宜急于求成。

..... (204)

十六、组织集体项目之经验教训

我不记得这个项目磨蹭了多少时日了，少说也有两三年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这次经历更坚定了我

原有的想法：“没边”的事情决不可为。

..... (213)

十七、电影与政治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91年1月16日上午，因为我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等待的过程中，从电视上看到美国空军猛烈轰炸巴格达的画面，海湾战争中的“沙漠风暴行动”就在那一天开始。

..... (225)

十八、“老战友”和“老对手”

当时社内气氛极为紧张，“鸣放”性质的大字报不再出现，舍饭寺（我们工作单位所在地）冷清的过道里弥漫着一股阴森肃杀的空气，我却贴出一张大字报，大意是说要分清两类矛盾，不要把说了一些错话但显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推到敌对阵营里去。

..... (235)

十九、翻译、编辑、研究工作体会

不少人对翻译抱有轻视心理，电影界就有人蔑称之为“二道贩子”。……有一些人从这些译著中东抄西摘，编编凑凑，搞出什么“研究论文”甚至“专著”来，实在不如让人们阅读原作更可得益。无怪

乎，前一阵子有人称写这类东西的人为“三道贩子”，并说“现在三道贩子比二道贩子吃香”。

..... (253)

二十、“夕阳余晖”

记得 1976 年“文革”结束后，这些桥友（包括丁关根同志在内）曾在我家聚会，搞出了一个我们称之为“76 北京精确法”的叫牌体系。

..... (261)

后 记

..... (268)

引言

李传松

我国著名戏剧、电影理论家、翻译家郑雪来先生，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为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撰写、翻译的书籍及论文多达一千余万字。通过他主编的好几个刊物、辞典、丛书培养了一大批翻译和研究人才。他曾出访欧美诸多国家从事各种学术活动，曾担任十多个全国性艺术协会、学会、学术刊物、研究机构的理事、名誉理事、编委、学术委员等社会职务。他还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30 余所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以及众多电影、话剧、戏曲、电视以至军事等单位做过大量讲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先生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全国政协、福建省政协的相关机构及一些刊物曾一再邀请他撰写回忆录，回顾他的一生，或重点叙述他的某些生活片段，诸如二战期间在印缅战区的经历，“文革”中的遭遇，他所从事的电影、戏剧研究活动，他在长期翻译工作中的体会和感受，他在国外的见闻等等，但先生都予以婉辞。他经常对我说，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又不是什么歌星、影星、球星之类，人们未必会对他的“回忆”感兴趣，说他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比



起那些卓有成就的学者来算不了什么，似乎不值得去大肆宣扬。对此，我一直有不同看法。

与先生五十多年的接触，使我感到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这至少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是一个完全靠“个人奋斗”而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常常笑对别人说，在诸多专家学者中，他学历最浅，因为只读过半年高中和一年大学。然而他却通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掌握了三种外文。他涉猎甚广，除主攻的戏剧、电影理论外，在文学、美学、比较艺术、政论等领域也有颇多建树。而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不懈努力达到的。

二、他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具的一种傲骨，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作为非党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人称“党外布尔什维克”。从他的许多论著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始终如一的原则性，而且往往为他在某些学术问题上的预见性和独到见解而感到惊讶，因而被有关学界普遍认为是新时期涌现的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的文艺理论家之一。

三、他有极其丰富多彩甚至有些传奇的生活经历。他有过相当“风光”的日子，也度过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未满19岁就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文艺理论家》杂志的一篇关于他的传记文章中所言：“24岁是个不大的年龄。相对于别的24岁的人，郑雪来经历了别人无法经历的事。他24年的阅历是丰富多彩的。”而在这以后，他又经历了许许多多富于传奇色彩的事情。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心胸坦荡，为人处事总是爱憎分明，真诚为本，动真情，掏真心，说真话，办实事，以真诚纯朴直面人生。那篇传记文章

标题为《一个坦诚的灵魂》，用于形容他的人品一点也不为过。

因此，我多年来一直劝请先生把他的种种经历写出来。作为一个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我深深感到，他的生平事迹对青年人一定会有所启迪和激励。一个人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坎坷灾难在所难免。如何面对逆境，迎难而上，这才是人生的真谛。而先生早年坎坷遭际及其一生奋斗历程，正为人们提供了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始终如一的乐天派、英国诗人雪莱写下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充满希望的诗句，而先生则以他一生岁月实践这一充满哲理的诗句。

几经劝说，先生终于接受我的建议，同意以“师生谈心”的形式来“回眸”他的“风雨”历程。先生已届耄耋之年，我也年过古稀。我希望，我们这两个老头的唠叨絮语会给青年朋友们留下一点什么东西。

一、家世与幼年

李传松（以下简称李）：记得1988年第1期《文艺理论家》杂志发表的采访记《一个坦诚的灵魂——记著名电影美学家郑雪来》，其中有一段是介绍你的家世和童年生活的，郑先生是不是可以更详细地补充一下这些情况？

郑雪来（以下简称郑）：我于1925年10月29日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县（现已设市）屿头乡。我的祖父郑能梓没有多少文化，靠白手起家，在我出生时已创下不小的基业。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时我们家拥有乡里唯一的一座“洋楼”，冠名“带草庐”，大门上方还挂着一个十字架。我记得童年时每天早上都要做礼拜，每顿饭前都要祈祷，念完“感谢主，阿门！”后才动筷。祖父严格按照教会规定，将他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十一捐”捐献给当地教会，还印了大批带圣经故事的图片分发给教友们。我七八岁时就受“浸礼”，成为一名小基督徒。祖父主要做纸的生意，总行设在福州，尤溪口等处还设有分行，同时他又是美孚洋行在闽北地区的总代理商，靠当时点煤油灯必不可少的“洋油”发了一大笔财。但他自己生活相当简朴，长年穿着一件布长衫，没有什么抽烟、喝酒、赌博之类嗜好，他还乐于助人，乡里许多穷

人都受过他的接济。所以当他 1935 年去世的时候，本乡和外乡相当多的人们都来给他送葬。我始终对他保持一种崇敬的心情。

我对父亲郑为栋的印象恰恰相反。他虽然也是基督徒（我们全家长辈几乎都是），受过教会中学教育，但当时福州那些做生意的“老板”们常见的恶习他应有尽有，酗酒、赌博等等无所不为。他靠开“京果行”（即杂货行）和继承祖父当美孚洋行的代理商赚了不少钱，但他挥霍无度，家里境况远不如祖父在世时那样宽裕。我最看不惯的是他那浓厚的重男轻女观念。我作为“长子长孙”固然受到优厚待遇，但我的那些妹妹们远非如此。有一个小妹妹，在她刚满两周岁时差点被他抛到水里溺死，幸好被我及时制止。一回想起这件事，我就很痛心，并为他感到羞耻。家里我最崇敬的人当中，除了我祖父外，就是我母亲陈梅珠了。她出身贫寒，也像祖父一样乐于助人，常常瞒着父亲接济穷人，受过她恩惠的一些人后来都对我提起这事，并表示对她的怀念。我想，如果不是母亲勤俭持家并由舅舅陈心潮长时期为店铺管帐，家道早就中落了。母亲于 1943 年染上鼠疫不幸逝世，这是我在今年离家远走的主要原因。

李：那篇采访记中说你幼年时频繁变换学校，并且聪明过人，很小年纪就读过不少书。是这样吗？

郑：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小时候是个很普通的孩子，谈不上什么“聪明过人”，倒是相当顽皮甚至近乎顽劣。有一次父亲新买回一幅国画，我觉得黑漆漆的很难看，就用红铅笔给添上些什么。父亲回家一看，气得使劲用鞭子抽打我，痛得我把头钻到灶洞里去，幸亏外婆说情，才没有受到



更大的折磨。不断变换学校却是真的。我最早上的是教会小学，跟我的一位远房姑姑（郑淑英）住在一起。不久不知为什么又转到屿头乡下和福州读私塾，去背那些“之乎者也”、“子曰书云”之类的东西。我的学习并不出色，因为背不出课文，被老师罚打手心是常事，那时我太贪玩了。后来我又上了福州南郡小学，这可能是我真正“开窍”的起始。读五年级时，班主任王仰高先生，一位从东北流亡到福建的中年汉子，编了一本充满抗日精神的“三字经”作为我们的国文教材。这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校长丁幼铭先生是进步人士，他经常在学校里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我小学毕业那年（1938年），校里组织演唱《黄河大合唱》，我也参加了。所以不久后福州被日军占领，街边上坐着几排日本兵，行人路过都被勒令行鞠躬礼，我也不得不照此行事时，心里却充满着憎恶和仇恨。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英国圣公会办的福州三一中学（即现在的福州九中），但没过多久学校就疏散到福建崇安县郊外。夜里我常常看到漫山遍野都有一大片熠熠发光的磷火，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在国民党“大围剿”时牺牲的红军战士们的遗骨发出的光芒。我在三一中学只读了一年，就转学到闽北三育研究社，这是美国安息日会办的一所教会中学，可能我全家都是这个教会的教友，所以就被转到这所学校了。这所学校以现在的眼光看，教学质量并不怎么样，但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特别是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这时我才好像真的开了窍，在课外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了这“文库”的不少书，尤其喜欢读历史地理一类书籍，使我尔后受益匪浅。这些书使我感觉到世界是如此之浩大，人类的历史是如此之悠久，决不